经济时评

中国就业出现的新迹象新问题

□陈勇鸣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7.4%，创1990年经济增长3.8%以来最低。但1~8月份，全国新增就业人口970万人，占全年目标的97%，经济增速与就业增长背离。城镇调查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其中今年3、4、5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7%、5.15%、5.07%。

经济增速与就业增长背离的原因

中国出现经济增速与就业背离新迹象的直接原因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释放的改革红利，加之今年3月1日起，全国实施新的商事登记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创业门槛大大降低。1—8月份，新注册市场主体超800万家，带动上千万人就业。就新注册企业数而言，自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开始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同比增幅近60%。

经济增速与就业背离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淡出。今年新增就业1000万的目标主要靠第三产业实现。实际上，去年已经出现就业与经济增速背离的现象。2013年经济增速7.7%，新增就业1300万，即每一个经济增长点带动168万个新增就业。按此推算，今年要实现1000万就业岗位，只需6%的经济增长即可实现。李克强总理指出，过去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促进效应远超第二产业。然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如第二产业，我们发展第三产业，不是在第二产业萎缩基础上，而是要求工业增加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现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GDP增速，8月份规模工业增加值只有6.9%，说明该行业在萎缩。同时，要防止中国人口红利的过快淡出。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值在下降。2010年15~59岁的劳动力93961万人，到2013年下降到93500万人。中国人口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2003年以前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企业不用加工资，劳动力无限供给。2003年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进入相对过剩，企业工资不增加，劳动力就稳不住，2010年以后，不管企业涨不涨工资，劳动力绝对值下降。到2015年15~64岁的劳动力也开始下降。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基数大，绝对值下降并不影响企业用工，实际不然。中国就业已呈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就业出现的新现象

目前中国就业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有：一是农民工找工作容易，大学生就业难。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27万，创历史新高。二是青年人就业容易，中年人就业难。三是东部大城市找工作容易，中西部小城镇难。中国就业出现的新问题是由中国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失衡造成的。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贡献不够。投资三大领域，基础设施、房地产需要多少大学生。工业投资，大部分企业主要不是在两头，即搞研发、设计、品牌、网络、营销、管理、市场和价值链，而是大量引进流水线，追求成本最低，流水线上需要几个大学生。从人口结构看，中国青年劳动力逐年减少已是客观事实。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1月的数据，2010—2030年全世界年轻适龄（15~29岁）工作人口预计增长超过7000万，中国减少1个亿，2010—2030年全世界50~64岁人口的预计增长4.31亿，中国增加9500万。“六普”发现中国人口大量集中在40~44岁和20~24岁这两个年龄段，20岁以下人口迅速减少。今后10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如不到位，中年人就业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从区域发展结构看，由于沿海大城市集中过多的经济发展资源，导致大量流动人口涌向沿海大城市，大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剧增，生活成本上升。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口过多流失，造成服务业难以集聚，工作岗位减少。



就业问题解决途径

解决中国就业出现的新问题，需进一步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

首先，加快结构性减税步伐，提高全社会创业积极性。结构性减税涵盖以下四方面：一是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国务院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至2015年底，月销售额3万以下小微企业等暂免征增值税。从2014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对于年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50%计入应纳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务总局对小微企业标准大大放宽。作者认为，应将这两项政策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加大民生领域的税收支持力度，如通过制定老年产品税收减免政策，非公有制养老服务机构税赋减免政策，包括养老机构、老年产业用地优惠，养老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燃气、电信的优惠，补贴政策、政府采购及鼓励社会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捐助等扶持养老产业发展。三是通过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降低奢侈品关税。四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

其次，加快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全国推广，扩大服务业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18个方面服务项目开放。一方面为社会投资找到新领域、新出路，另一方面服务业投资开放，为青年大学生就业找到新的渠道。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践看，今后5年自贸区新增就业岗位至少20万个，而且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才能胜任的就业岗位。

再次，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养老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型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其衣食住行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包括老年用品制造零售业，养老房地产业，居家养老服务业，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业，养老保险理财业，养老教育服务业，养老精神文化娱乐业，养老人员培训业等。目前，一方面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急需的老龄产品又无人生产。2012年全国老年人退休金1万亿，加上养老储蓄几万亿，2020年和2030年全国老年人退休金分别达到2.8万亿和7.3万亿。但是国内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不足1000亿。目前与老年服务业密切关联的上游产业，包括老年健康医疗用品产业、老年食品保健产业、老年生活用品产业、老年居住建筑产业、老年复健及辅助用品产业、老年休闲娱乐用品产业等更是严重缺乏。此外，老年旅游、老年教育、老年保险、老年财务规划、老年后事规划等软性产业领域也处于空白或低水平开发阶段。发达国家老龄产业成功走向市场，老年人的社会保险、社会服务等公共支出是年轻人的3倍，已成为第三产业重要支撑。增加老龄产业有效供给能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据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中老年劳动力的绝对量还会增加，结构性失业会更加严重。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减弱，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一批职工下岗，这些人需要重新就业，随着社会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就业。要解决中老年劳动力就业，发展老龄产业是最合适的。

最后，加快产业的梯度转移。全球产业经历四次大规模转移。第一轮是上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本产业转移；第二轮是70年代日本向“东亚四小龙”的产业转移；第三轮是80年代中期“四小龙”向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第四轮产业是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扩展和向越南、印度等低成本国家产业转移。外资在中国投资路线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投资占70%以上。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长三角”崛起，与“珠三角”平分秋色。21世纪初环渤海兴起，外资向北集聚。最近几年外资向中西部转移。2011年上海一个年产值2106亿元的代工企业广达电脑，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78%，雇工6.5万，现转移到重庆，带走大量就业人员。而广达集团在松江启动“云计算”计划，第一条生产线月产值在11亿至12亿元。

经济学家

结构调整的通则

□王东京

前篇文章我写“结构调整的误区”，说“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工业化后期不成立。何以下此判断？文中我举证的是今天欧美国家回归制造业的事实。有读者问：欧美回归制造业是长期趋势么？倘若只是昙花一现，怎可证明“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工业化后期不成立呢？

问得好，值得答。是的，从证伪的角度讲，要推翻某个命题只需举证一个相反的事实，但前提是这事实必须真实可靠。问题是，欧美国家回归制造业是真实可靠的事实么？真实性毋庸置疑，但扪心自问，这趋势日后会否再逆转却不敢肯定。由此看，用一个尚不确定的事实判定理论不成立确实欠严密，至少不是无懈可击。

该怎样补救呢？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应回到理论上来。未来虽无法预知，但却可按逻辑作推测。配第当年提出结构演进的思想，依据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人们要追求高收入，劳动力才会从农业依次向工业与商业转移。要追问的是，农业收益低于工业或工业收益低于商业是否是铁律？假若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当然成立；若不是，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在我看来，农业收益低于工业、工业收益低于商业并非铁律。理论上，一个产业收益高低其实与产业的性质无关，只与稀缺程度有关。供求原理说：供不应求价高利大，供过于求价低利小。所谓物以稀为贵，讲的就是这道理。工业化初期农业收益所以低于工业，那是因为工业品相对稀缺；而工业化后服务业收益高于工业，也是服务品相对稀缺。问题在于，服务业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一旦服务品不稀缺，收益当然就不会高过别的产业了。

好了，就说这些，算是对前文的补充。下面言归正传，讨论结构调整的通则。所谓结构调整，是指一个国家的产业如何定位，归根到底是指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参与国际分工。从这个角度看，可借鉴的理论框架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赫俄模型”，波特的“钻石模型”，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所推崇的还是斯密与李嘉图，因为别的分工理论并无突破性贡献，只是对斯密与李嘉图理论的发挥而已。

有个大胆的想法，我认为可将斯密与李嘉图的分工原理作为结构调整的通则，也可称为“斯密—李嘉图定理”。完整表述是：“假如国际贸易自由，一个国家按绝对（或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结果不仅对这个国家有利，而且可增进社会整体福利。”其实，此定理的结论斯密与李嘉图早有论证，学界也有共识，可为何要把“贸易自由”作为假设前提呢？

前文说了，定理是一个“假言判断”，能满足假设（约束）条件，定理成立，否则就不成立。试想一下，若存在贸易壁垒，一个国家想出口的商品出不去，需进口的商品进不来，它怎可能按自己优势参与分工？举国内分工的例子，目前各地结构趋同，其实与地区封锁有关。商务部曾对22个省、市作过调查，发现其中有20个搞贸易保护，这样地区间很难分工，只能“大而全”“小而全”。国内分工如此，国际分工也一样，贸易不自由也是目前不少国家未按自己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原因。

是的，国际分工要以贸易自由为前提，此点容易理解，真正的困难，是要解释“斯密—李嘉图定理”为何可作为结构调整的通则？这是说，只要国际贸易自由，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应按自己的优势参与分工。对此，可分两种情况分析。

第一种情况：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阶段为何要按“斯密—李嘉图定理”参与分工？答案是为了扬长避短。韩国是成功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韩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举打入国际市场，为日后的“汉江奇迹”奠定了基础。相反的例子是巴西。近百年巴西经历了从经济崛起、后步入衰退的过程。论资源优势，巴西得天独厚，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可耕地和先进的农业科技，可它没利用好自己的优势（耕地利用率仅7.5%），试图搞超越式发展，结果由于过度依赖国际资本，令经济长期陷入低谷。

第二种情况：一个国家到了工业化后期为何还要按“斯密—李嘉图定理”参与分工？理由同样是扬长避短。这方面成功例子多，美、英、德、日是举世公认的发达国家，但其产业定位却各不相同：美国以IT高科技为主导；英国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德国以制造业为主导；日本则以终端消费品生产为主导。不成功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本应重点发展相关产业，但冰岛认为搞金融才能暴富，于是一时间各类银行、信托、保险机构如过江之鲫，哪曾想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冰岛金融业全线坍塌，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最后再说中国的结构调整。规则当然也是“斯密—李嘉图定理”，但操作上应有区分：一是国内分工要打破地区封锁，鼓励各地根据本地优势调结构；二是国家层面参与国际分工，既要立足本国优势，但也要顾及“贸易保护”盛行的现实。这样看，近期还得审时度势、相机抉择才是。

宏观观察

以全球化思维参与国际竞争

□本报记者 林 娜

“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速仍将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也高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增速，这得益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在“2014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暨TCL跨国并购十年回顾”研讨会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明确提出上述观点。

2013年我国当年对外投资额达到了约1080亿美元，是2002年的40倍，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今年1至10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达到82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8%。预计在今年或明年我国的对外投资将超过实际流入的外商投资。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历程依然存在很多挑战和风险，国际化战略组合尚不完备，这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强跨国并购企业案例研究，总结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聚焦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的宝贵经验和研究成果，将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国际化进程提供有益借鉴。11月28日，“2014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暨TCL跨国并购十年回顾”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就中国企业如何以全球化思维和国际视野参与全球竞争展开深入研讨。

提高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适应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着重强调，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政府都要学习、参与新的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建设。因为，一是今天很多走出去的企业对于全球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不是那么熟悉，二是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变动、新的升级，即使我们对于原有的规则还比较熟悉，也需要不断吸取新的知识。

把握全球市场发展大趋势。吴敬琏表示，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中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强调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的企业要把握全球市场发展大趋势，现在中国市场已经不是跟全球市场隔离开来的一个孤立市场。这个市场发展的趋势不管是技术趋势，还是经营模式上的趋势，都会对每一个企业，不管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在国内营销的企业产生影响。

广泛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信息化部总经济师周子学在发言中强调，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不断成熟，给整个经济带来很多颠覆性的革命。互联网当初只是一个新型通信手段，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通信手段，已经变成了人们工作和部分生活的场所，它的确是一个谁都离不开的基础平台。互联网融合能力或者颠覆能力极强，融合哪个产业，哪个产业就会变形。简单回顾一下，它先进入音乐行业，最后把唱片彻底打倒，它跟工业融合，最后原来那个工业一套做法全变了，生产模型都改了。它跟商业结合，就是电子商务，给传统商业以极大挑战。因此跨国企业要在未来有持续竞争力就一定要研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构建属于自己的全球产业生态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指出，未来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发展瓶颈不是市场容量的限制，而是如何通过创新提高中国品牌的溢价能力，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价值链高价值区域的提升。这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以全球化思维迎接挑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构建属于自己的全球产业生态圈。

立足全球资源整合。当前国内企业向外走有五大内在的动因，辜胜阻分析：一是转移过剩产能，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企业走出去；二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需要企业走出去；三是突破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需要企业走出去；四是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提高企业投资回报；五是规避高成本压力需要企业走出去。从2004年到2013年，并购特别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并购速度增长非常快。企业开始的时候是通过出口引发对外投资，然后是自然导向的并购，再就是立足全球整合的并购。我们现在正趋于立足全球资源整合并购第三个阶段。跨国并购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成为海外投资的亮点。

从9个方面努力。辜胜阻还提出，我们的企业国际化有以下需要：政府有宏观指导，提高服务水平；银行拓宽外储运用渠道和金融服务；市场满足国际化人才、技术和资金需求；商会协会加强自律，避免造成无序恶性竞争，造成窝里斗；外交提示防范风险，充分发挥老外交家的作用；中小企业抱团推进产业集群发展；重视股权投资基金PE作用；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咨询及法律服务；企业推进人才多元化、品牌高端化、管理国际化、生产专业化、发展集群化。

需要胆略，也要创新。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总结企业海外并购十几年经验时提出，为什么当时不把东西做得更好一点，想得更周到一点，理论上都是对的，后来回想起来，并购是一个机会事件，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想好了才做。什么东西都想好了，就等不到你了，机会就不是你的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道路和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道路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复制，中国企业国际化可能在扩张的同时还要反向学习。你一定要从这些欧洲、美国企业经济运作当中借鉴更多成功的经验。

汲取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教训。李东生同与会者深入交流了企业并购中的教训：一是在国际化当中特别是一些收购并购活动当中，一定要抵住诱惑。如，TCL并购法国汤姆逊。2003年底和汤姆逊谈的几乎达成协议前，当时他们突然通知我，他们给我们的业绩比预算有巨大的差距，这说明是有风险的。当时我们想重新谈条件，他们也同意了。但是我抵不住诱惑，认为收购之后就成为行业第三了，同时又是在我们国家领导人访问的时候签约，这个诱惑很大。现在看来做企业一定要遵循企业的规律，再谈两个月，就能拿到好的条件。所以要抵住诱惑，任何时候保持冷静判断，这是我们的教训。二是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当时并购汤姆逊的时候，我们应该融资而不是做银行贷款，这也是一个教训，不要把东西想得太理想，很多没有想到的困难会发生，所以一定要留着充足的弹药，保持自己有强大的预备队。三是人才储备永远不够。当年如果人才储备力度更大一些，我们走得会更顺一些。四是在产品和市场转型期进行并购，将放大风险，这点要充分地估计。五是吃透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们在欧洲市场吃亏非常大。

从两个维度思考选择整合模式。中国企业在跨国兼并当中采用什么样的整合模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忻榕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分析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企业自身企业管理能力和财务及未来增值潜力的强弱，来选择几种不同的并购方式。第一是反向学习，它比我们强，我们可以向它学习，从而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第二是复制贯彻，我很强，我希望我的并购方能够用我的方法去经营去管理、去开拓市场，进行研发制造；第三是创新整合，用你强的和我强的结合在一起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创造出更好更多的价值。

强化反向学习意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王高教授认为，TCL在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反向学习过程中，企业本身研发和技术能力、海外销售渠道拓展能力、海外市场以及它在整个生产系统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流程、制度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获得了它想要的资源和能力，这就是品牌的影响力，运营商的渠道，以及核心的技术和专利。反向学习的方式强化了TCL在中国的技术、产品和质量能力的提升。

关注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中央党校赵振华教授提出，企业要推行技术创新，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时代，尤其要关注颠覆性的技术，同时也要更加关注营销模式创新，只有营销模式创新跨国并购才能真正引领企业走向世界。他还强调企业走出去要遵循规律，抵御低价诱惑，抵御不住可能会有风险。